敌后战场的宣传利器——

新四军在皖南创办《抗敌报》

■徐 升 周 一

1938年4月初，新四军第2支队与第1支队在安徽歙县会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随即提议，创办一份新四军自己的报纸，作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媒介。5月1日，《抗敌报》在皖南创刊，主要报道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人民武装进行的抗日斗争和部分社论文章等。

创刊之初，由于缺少合适的印刷纸张，《抗敌报》只能使用当地的黄土纸印刷，又粗又厚还不美观。当新四军领导了解到附近十几公里的小岭地区特产宣纸时，专门派人同那里的宣纸手工艺人取得联系，以新四军的名义和他们开办了宣纸合作社。有了稳定的纸张来源，《抗敌报》也由初创时期的8开1版，逐步改为4开4版，并增设了文艺、战士园地、抗敌剧场、新文字、青年队等副刊，广泛吸收一线官兵来稿，宣传作用不断增强。至1941年1月停刊，《抗敌报》共出版221期，在新四军内部乃至广大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宣传利器。

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报》编辑室。

1940年5月22日《抗敌报》版面。

讲战斗历程，鼓舞军心民心。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及许多地方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取得了许多骄人战绩。然而，在信息传递极为不便的战争年代和日军严酷封锁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对我军战果并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为此，《抗敌报》以“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分裂，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办报宗旨，大力宣传我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在安徽巢县附近的蒋家河口一带伏击日军一部。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军仅用时20分钟，在自身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全歼了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20余人。这一战绩不仅震惊了日军，就连蒋介石也致电祝贺：“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7月30日，《抗敌报》以特刊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战斗的过程和战果，战士们看到兄弟部队取得如此战绩，纷纷表示也要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不少根据地群众看到报道中“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的文字后，拍手称快、信心倍增。

1940年，新四军的敌后游击作战蓬勃发展，先后在梅冲、何家湾、父子岭击败敌人，同年10月又在左坑、枫坑、泾县取得了10天内三战三捷的丰硕战果，总计歼敌近3000人，粉碎了敌人对皖南的“扫荡”。10月16日，《抗敌报》发表社论《我们在胜利中战斗》，详细报道了这些战斗的经过，并对根据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作出高度评价，号召大家“继承今天的成绩保持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一篇报道，让新四军的战斗威风跃然纸上，军民团结的抗敌斗志不断高涨，皖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写基层故事，丰富官兵生活。考虑到战士的文化水平有限，《抗敌报》多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生动别致的安排，吸引官兵阅读。在普遍增强文化素养的同时，将基层新闻广为传播，增进不同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

1939年初，为更好地开展体育训练，以适应强度越来越大的战斗生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撰写《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军队中的体育》等文章，刊发在《抗敌报》上。这些文章喊出了“建军必先建人”的动员口号，将拟在全军推广实施的体育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结合日常战斗生活的体能训练项目，比如着装赛跑、障碍赛跑、投手榴弹等；一类是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全军范围的体育运动会。文章配以具体的训练内容插图和体能考核标准，便于理解和组织考评，基层官兵可以直接对照报纸进行体育训练，极为便利。

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在军部云岭举行了纪念“五卅”体育运动大会，设置了赛跑、篮球、跳高、跳远等比赛项目。在大会举办过程中，《抗敌报》的记者们活跃在各个赛场，将运动员们的表现记录下来，并以连载的形式报道了整个比赛过程。没有来到军部比赛的官兵，在看到报道之后纷纷来信来稿，有的当起了场外啦啦队，为运动员加油助威；有的则开始了异地竞技，把自己的比武成绩亮出来，要和参赛队员比试比试。一时间，新四军内部掀起了体育训练的热潮，官兵身体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刊重要评论，扩大政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谈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为实现办报宗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刊发数篇国内外重要评论文章，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视角，纵论战争风云、分析时局变化。

创刊以来，《抗敌报》先后发表《论欧洲形势》《美国远东政策》《绝望挣扎中的日寇》等文章，向处于敌后广大地区的军民普及政治理论和时势知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读者看清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深刻理解中国军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报纸上还登载一些外国人对新四军的评论文章，比如美国记者斯诺的《新四军印象记》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新四军优秀的伤兵医院》《史沫特莱在皖南》，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的战斗生活状态。

为扩大我党我军尤其是新四军的影响力，地下工作者把《抗敌报》剪成细条夹带出去，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重新拼接印刷，并广泛发行。生活在侵华日军铁蹄之下的江浙沪群众，原以为自己身处一个饱受压迫的“孤岛”，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作战的消息之后，满怀信心地开展了多种支援前线的活动。仅1938年至1941年，就有5000余名上海学生、工人、公司职员等冲破层层阻碍，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并带来了大量军需物资，有力支援了新四军的作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前夕，《抗敌报》在新四军军部转移前出版了最后一期，并及时将印刷好的报纸散发到已经踏上征途的官兵手中。这一期刊载了题为《临别赠言》的长篇社论，并在社论上套红叠印8个大字：“告别皖南，进军敌后”。社论中写道：“当我们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之时，我们一定能够重温今日依恋的情景，而欢欣鼓舞于新中国的诞生！”无数官兵和群众读过之后不禁潸然泪下，在痛心之余更是激起内心深处抗击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胜信念，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侵略者，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链接历史

虎口夺金送延安

■孙肖龙 于学志

巍巍玲珑山，漫漫黄金脉。山东招远自古以盛产黄金而闻名，辖区内分布着2000余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1000余个古老的矿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玲珑金矿。抗战时期，招远军民睿智果敢、舍生忘死，一次次越过敌军封锁，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成就“十三万两黄金送延安”的壮举，极大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状况，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延安封锁，急需“通货”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划拨的军费十分有限。抗战开始后，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恐共产党军队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军费，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根据地党政军经费愈加困难。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当时，党中央手中的黄金与外汇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对此甚为关切。毛泽东曾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

1938年上半年，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亲身感受到延安的财政紧张和拮据，提出利用山东胶东产金的有利条件，向党中央输送黄金，支持延安经济，缓解中央压力。日军侵华后，东北、华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军占据。山东是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和鲁中，而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招远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

回到山东后，黎玉立即指示胶东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黄金支援党中央。中共山东分局受命后，立即想方设法在胶东等地密筹。筹金送延安，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年8月撤改成立玲珑采金局，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方筹措黄金，组织根据地军民和矿工同日伪军开展夺金斗争。

筹集黄金，为国而战

对于招远的黄金，日军觊觎已久。1939年2月27日，日军的铁蹄踏进招远县城，第二天便侵占了玲珑金矿。由于原来的开采规模不够大，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后不久，又建设了一座日处理矿石150吨的选矿厂，对玲珑金矿及周边金矿实施空前规模的掠夺。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面对日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盗采，胶东区党组织军民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掠夺斗争。

第一种形式是直接控制金矿，组织矿工采金。为筹集黄金，中共胶东特委在招远秘密筹建金矿，领导群众采金。当时的黄金主要靠土法提炼，生产出的成品金均按照租赁协议筹集上来。由于成立了专门机构和工会组织，又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极大调动了群众的采金积极性，黄金生产得以快速发展。除实行个体生产外，胶东党组织还成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组织。这些生产组织每年的税金也有数万两。

对于被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所控制的一些小规模矿点，胶东党组织决定秘密控制金矿，团结工人群众掘金。据史料记载，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秘密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由于当时玲珑金矿已被日寇占领，苏继光把筹金重点放在蚕庄矿区。他化装成矿工融入到蚕庄金矿矿工队伍，并逐渐成为矿工的主心骨。当他了解到天津籍矿主许老板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且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矛盾很深，于是以国府官员和山东省总工会的名义“视察”金矿。在取得许老板信任、得到所藏枪支后，组成工人护矿队，有效控制了矿区生产。

第二种是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装夺取黄金。虽然地下党组织发动矿工利用各种办法筹集黄金，但毕竟数量有限，大批黄金仍然在日寇手中，一车车富矿石和成品金从玲珑金矿运出，流向日本。为尽快筹集到更多的黄金，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胶东党组织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夺取黄金，武装截击日寇运金车。当时，日军掠夺的黄金主要通过龙(口)招(远)公路送到龙口，经龙口港海运到日本。从玲珑金矿到龙口港沿途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每隔几里就修建一个据点，岗哨林立，重兵把守。招远军民团结一心，紧密配合，先后在龙招公路沿线的沙埠村、小李家、张星镇、槐树庄、馆前姜家等处，多次伏击日寇运金车，炸毁敌汽车30余辆，消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了大量富矿石、金精矿和军需、生产物资。

第三种就是组织矿工罢工，带领矿工智取黄金。1941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安排人员秘密潜入敌人占领的玲珑金矿，并制订了一系列行动方案。一方面，秘密组织矿工罢工或怠工，破坏生产设备；另一方面，秘密收集黄金、水银、雷管和炸药等，上交组织支援抗日。

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地下党员姜璇在玲珑金矿组织矿工往外运黄金。姜璇混入矿工队伍后，很快当选矿课长。他利用职务秘密宣传抗日精神。矿工们对日本人很是愤恨，听说是为了抗日筹集经费，都愿意冒险参加夺金行动。面对日军岗哨每天严格的搜身检查，为了把金粉带出去，姜璇和矿工们想了许多办法。有的把金粉搓到头发里，回家洗出来；有的塞到菜窝窝里，一边吃着一边让岗哨检查；有的把金粉放到破棉袄的棉絮里，夹在双层鞋底里、送饭篮子里；有的将高品位的矿石偷偷带出来磨成粉，再提炼出金粉。

最后一种方式是建立地下收购站，从群众手中收金。抗战时期，除日军大肆掠夺黄金外，一些私商也在大量抢购黄金。对此，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通过多种形式与日军和私商争购黄金，当地的党组织也积极配合，宣传黄金对共产党抗战的作用，教育广大群众资共不资敌。当时黄金收购工作不仅风险大，而且保密要求高，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在与日军的“黄金争夺战”中，有不少优秀的胶东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克服万难，密送黄金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招远军民历经千辛万苦从日军“虎口”里夺回来的黄金，除满足自己的经费使用外，大部分运往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鲁南地区，然后由此转送延安。这送金之路不仅需要穿越敌军上百道封锁线，还要越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区。为此，中共胶东特委和胶东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组成一批批运金小分队，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分段接力等方法，将黄金秘密运至延安。为防范泄密，送金分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过程。每一名送金队员都严格执行了这一命令。

对于运送黄金路线的选择，因受战争环境制约，不同时期走不同的路线。1939年至1943年，送金之路主要是经过“渤海走廊”，即从我党在胶东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根据地出发，经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清河区寿光等县，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沂蒙山区、山东分局驻地。自1944年秋后，由于胶东跟滨海地区的交通线被打通，送金路线从“渤海走廊”改为“滨海通道”，即从胶县、高密穿过铁路，经滨海区诸城等县直达山东分局所在地。

据山东招远县有关档案记载，1937年至1945年，胶东特委和玲珑金矿筹集了大约13万两黄金送到延安党中央。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中，黄金从没有短缺过半两，更没有一人携金叛逃，每一两都交到党中央手中。在民族大义面前，招远军民怀着对党忠诚的坚定革命信念，舍生忘死，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逐流江河巧运兵

——中国古代的水运战术

■洛旭阳

在中国古代，大江大河既是阻挡敌人的天然水障，也是航渡突击、远距离运兵的自然通道。水运战术，在多次古代战争中一再应用，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工程的重要内容，为江河地带决战决胜提供重要保障。

水上运兵，是长途奔袭、迂回攻击的重要助力。建武十一年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统一北方后，挥兵攻打蜀地。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东依三峡、北靠巴山，据险防守。刘秀则采取南北合击、水陆并进、钳攻成都的作战方略：一方面派大将岑彭等率6万余人，乘战船数千艘，溯长江向西进兵；另一方面，命大将来歙等从甘肃天水出兵，伺机南下。为打破蜀军在荆门与虎牙“两山夹江”的防御要塞，岑彭以攻击蜀军浮桥为首要目标。攻击发起之日，汉军将士乘船逆流而上，以火炬点燃蜀军浮桥、望楼，风怒火盛，迅即将其烧毁。岑彭所率的大队战船，乘风势急进，所向披靡。失去浮桥的蜀军顿时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残部退保江州。岑彭率兵马3万余人，溯三峡西进，于六月长驱直抵江州。江州城池坚固，岑彭调整进军方向，率主力及降卒5万，溯涪水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以充军粮。公孙述急调重兵南下增援，据守广汉、资中、黄石等地，形成一道保卫成都的防线。针对蜀军的新部署，岑彭也临机应变，令降卒5万牵制蜀军，亲自率主力取道江州，溯江西进。八月，岑彭攻占黄石，击败侯丹部蜀军。接着，他率兵向蜀军防线的背后进击，昼夜倍道兼程，疾驰2000余里，攻克武阳，出精骑驰袭广都、直逼成都。蜀军无不震骇，连公孙述都不禁惊呼：“何其神也。”岑彭的南路攻蜀，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溯三峡进军，他利用江河实施水上机动，两次取道江州，北突西进，势如迅雷，为东汉统一蜀地创造了重要战机。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虢亭古战场遗址，历史上此地曾发生过多次战争。

水上运兵，也是故布疑阵、麻痹敌人的重要战场。隋开皇八年，隋文帝杨坚作出南伐攻陈的部署。次年正月，命令吴州总管贺若弼率军从广陵渡过长江袭击陈军，为隋朝大军攻克陈都城建康铺平道路。渡江作战前，贺若弼为迷惑敌军，命人把大部分船只隐藏起来，只在水道里摆放了五六十只破船。陈军见后以为隋军船只不足，无法渡过长江，便对隋军放松了警惕，渐渐产生麻痹轻敌的思想。与此同时，贺若弼频繁地组织江边隋军换防，每次换防都要到广陵集中，并且大造声势，多插旗帜，多搭帐篷。看到隋军的这种姿态，陈国守将刚开始还比较警惕，认为贺若弼要进兵来犯，马上集结精锐兵力准备迎战。发现隋军换防后、就松懈下来，把军队又调了回去。此后，隋军又屡次三番地组织换防，陈军对此习以为常，不再加以防备。孰料，贺若弼在换防的掩护下，早已把大军调集部署妥当。次年，贺若弼见陈军江防部队已经完全解除作战准备，突然挥师杀过江去。隋军渡江时，陈军竟然丝毫未发觉。待隋军发起攻击时，毫无防备的陈军落荒而逃。贺若弼顺利渡过长江，攻克南徐州，沿江陈国守军望风而逃。贺若弼越战越勇，仅用几天时间就打到建康，轻易攻占钟山，屯兵于白土冈以东。数日后，隋军俘获后主陈叔宝。立国32年的南陈由此灭亡。

水上运兵，是出其不意、跨越天堑的重要手段。北宋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亲临讲武池，阅训水军，准备讨伐南唐。当时，阻挡宋军进军步伐的最大障碍，是南唐军队固守的长江天险。开宝七年七月，池州进士樊若水向赵匡胤献策称，长江并非天堑，可造浮梁以渡大军，并详述浮梁架法、长短数目与时期变化等。赵匡胤力排众议，以樊若水为南征向导，并下令荆湖蜀等地，建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准备特制竹竿等物，为渡江造船造桥做好准备。同年十月下旬，宋军发起灭唐攻势，宋将曹彬率水陆军10万人发起进攻，南唐沿江守军未加防范。宋军越过南唐屯兵要地湖口，在池州以西的峡口寨登陆，沿长江南岸东进，不战而克池州。宋军命樊若水以黄黑龙船、大舰、巨竹为部件，在石牌口架设浮桥。闰十月十三日，宋军继续东进，大败各地南唐守军，连续攻占铜陵、芜湖、当涂等地，在采石矶击破江南2万余唐军。十一月初九，赵匡胤下诏把石牌口的浮桥移动到采石矶，以便集中在和州的宋军主力渡江。浮桥3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军通过时，如履平地。宋军大将潘美率领的马步兵由此迅速渡江，与曹彬会合。南唐重臣初闻宋军在采石矶架浮桥时，还大言不惭：“载籍以来，无有此事，此必不成。”等到宋军江北大军由浮桥渡江，南唐君臣才感到害怕，匆忙调兵选将、水陆相济，攻打浮桥，然而均遭败绩。宋将曹彬乘胜追击，大败南唐军10万人于金陵城下，包围金陵。次年十一月，曹彬发动总攻。月底，金陵城破，李煜奉表纳降，南唐由此灭国。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与战法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